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陈思和 汪涌豪 主编

陈引驰 / 著

庄子 精读

/逍遥：依循自然的自由 / 秋水：兼摄逍遥与齐物
/齐物：道视野中的宇宙 / 养生：人生论说的脉络
/无为：植根人性的政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精读/陈引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9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ISBN 7-309-04726-5

I. 庄… II. 陈… III. 庄子-高等学校-教材
IV. 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856 号

庄子精读

陈引驰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95 千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书号 ISBN 7-309-04726-5/I·333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陈思和 汪涌豪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作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带连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迹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

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三辑、每辑十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遗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

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养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大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

目 录

第一讲 导论：庄子其人及其书	1
一、《庄子》中的庄子	5
二、篇目 分篇 真伪	10
第二讲 逍遥：依循自然的自由	28
一、鲲鹏的寓言世界	28
二、逍遥之游的境界	42
三、无名无功与无己	52
第三讲 秋水：兼摄逍遥与齐物	65
一、河海的小大之辩	65
二、守天反真的精神	84
三、天机与濠上之乐	93
第四讲 齐物：道视野中的宇宙	104
一、“吾丧我”与天地人籁	104
二、“以明”与“道通为一”	114
三、“沉鱼落雁”与“物化”	129
第五讲 养生：人生论说的脉络	136
一、“缘督以为经”的养生	136
二、通情达理的生死观	144
三、后世的同情与不解	151
第六讲 无为：植根人性的政治	162
一、“尽己性”的自然人性	162
二、“尽物性”的“至德之世”	176
三、“绝圣弃知”“殚残圣法”	186
跋	200
参考文献	203

第一讲 导论：庄子其人及其书

经典的重要和意义，在今天不必多言了；其实，传统的学问之道便是以典籍为基础、为核心的。经典的一个表征就是语言乃至观念的延展性和生命力。据说《圣经》和莎士比亚是西方人引用最多的。说到《庄子》，在精神层面上，这部书归属其名下的古代哲人庄子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所熟悉而倾心向慕的，“道家”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为代表形象——老子的思想固然影响很大，但作为情智兼具的形象似乎还是无法与庄子相比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之一，道与儒、释两家鼎立。如果以上面所谓的引述来考察，至少可以举出一点，《庄子》的成语非常之多。略略列举，就有诸如鹏程万里、扶摇直上、越俎代庖、大相径庭、不近人情（以上《逍遥游》）、沉鱼落雁、朝三暮四（以上《齐物论》）、庖丁解牛、踌躇满志、游刃有余、薪尽火传（以上《养生主》）、螳臂挡车（《人间世》）、相濡以沫、莫逆之交（以上《大宗师》）、虚与委蛇（《应帝王》）、断鹤续凫（《骈拇》）、识其一不识其二、大惑不解（以上《天地》）、得心应手（《天道》）、不主故常、东施效颦（以上《天运》）、吐故纳新（《刻意》）、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管窥锥指、邯郸学步（以上《秋水》）、呆若木鸡、鬼斧神工（以上《达生》）、君子之交、似是而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上《山木》）、亦步亦趋（《田子方》）、白驹过隙、每况愈下（以上《知北游》）、空谷足音、运斤成风（以上《徐无鬼》）、鲁莽灭裂（《则阳》）、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以上《外物》）、捉襟见肘

(《让王》)、摇唇鼓舌(《盗跖》)、分庭抗礼(《渔父》)、能者多劳、探骊得珠(以上《列御寇》)、学富五车、栉风沐雨(以上《天下》),等等^①。单就此题便不妨可以做一篇“《庄子》成语考”。仅此而言,《庄子》就堪称古典重要的经典。

读经典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握关键,以一当十。古书汗牛充栋,好像一辈子都读不完,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有限的,读了一些最重要的典籍,其余的也就势如破竹,略无疑难了。当初陈寅恪遇到前辈夏曾佑,夏说:你好啊,懂外文,可以读许多书,我把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事干啦!初听一定感到很奇怪,仔细想想很简单:中国重要的典籍就那些,读了它们,纲举目张,便得其要领了。以往讲究读书都是如此的,比如读史书一定先读“前四史”,不是说读了“前四史”就可以了解唐、宋、金、元、明的历史,而是说基本的条理、原则都在那儿了,再读起来不费劲了。读书得读关键经典这个道理,够境界的学者都知道。钱锺书“文革”后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一家大学图书馆,别人介绍他看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特别说及有些是举世独有的,他哈哈大笑;人家问他为什么笑,他答: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我不必读的书呵。确实,不少世上独一无二的书未必是值得读的。由此来看《庄子》,它作为子书,有些特别之处,虽然不似杂家以兼综为主,但也包容甚广,涉及道、儒、名^②、法等家,读之对诸家皆能从正面或反面增强了解,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里仅以儒家为例,历来就有学者认为《庄子》的主旨是表彰儒家而非反儒的。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非仅文人而已,他是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虽然他在《原道》等文章中力斥老子之学,其《送王秀才序》于庄子则以为出自儒学一脉:“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为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宋代肯定庄子与儒家的联系者渐多,苏轼《庄子祠堂记》质疑《庄子》中《让王》诸篇的主要理由就是“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林希逸《庄子口义》也

① 今见《韩非子》著名的“自相矛盾”寓言,《穀梁传疏》“哀公二年”引作《庄子》佚文。

② 庄子的朋友惠施是《庄子》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人物,其人便是先秦名辩之学的重要代表,《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一节,记载了许多名学论题,亦是公认的古代名学重要史料。《庄子》中庄子与惠施有许多论辩,甚至他也曾被视为“辩士”,见《至乐》篇“庄子之楚见空髑髅”一节。

说《庄子》的“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明代杨慎以为庄子“未尝非尧舜”，“未尝罪汤武”，“未尝毁孔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引）；袁宏道《广庄》称：“庄子去圣未远，七篇之中，半引孔语，语语破生死之的，倘谓蒙庄不实，则《中庸》亦伪书矣。”清代著《庄子雪》的陆树芝从另一角度论及庄子与儒家不相违背：“恐先圣之道寝以微灭，又重悲夫惑于异说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于是乎抗怀高寄而作《南华》。《南华》者，以异说扫异说，而功在六经者也。”（《读庄子杂说》）姚鼐提出“子夏之徒述夫子语，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而志气塞乎天地”，“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一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庄子章义序》）^①。章学诚也曾断言“荀、庄皆出子夏门人”（《文史通义·经解上》）。近代章太炎不同意庄子出子夏一脉的说法，以为“庄生传颜氏之儒”（《蓟汉昌言》卷一），于其承儒家之学而来则并无异词；其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庄子的批判》一文中承章说而发挥之；此外钟泰《庄子发微》亦力辩“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庄子发微序》）。这些意见或许未必能成定论，但《庄子》与儒家之关系确乎不是贬斥、排诋那么简单^②，由《庄子》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儒学是无疑的。

除了诸子各家，《庄子》对于了解道家的多层内涵也有助益。先秦时代其实并无“家”的概念，当时皆以“子”称论，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及《解蔽》等都是如此。各家的说法是到汉时才逐渐流行，经整齐诸子之言，乃出现所谓儒、道、墨、名、法、阴阳等等各家^③。“道家”一名，最初其实是指黄老之学，这在《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看得最清楚，其中记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

① 姚鼐所引云云大抵出《天下》。《天下》篇或以为未曾涉及孔子等诸儒家，而其实开篇的总论部分所论即是；林希逸《庄子口义》已指出该篇：“既总序了，方随家数言之，以其书自列于家数之中，而邹鲁之学乃铺述于总序之内，则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书皆矫激一偏之言，未曾不知圣门为正也。读其书，便见他学问本来甚正。”

② 《庄子》中涉及孔子、颜渊的文字甚多，有些确实不是一味贬抑的，如钟泰提出的《寓言》篇中“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一节便是。

③ 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节。

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悦）魏其等。”显然，“黄老之言”与“道家言”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所谓“道家”最初主要指黄老之学，在后代的观念中才逐渐发生指意偏移，谓所谓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承自稷下齐学，融汇了老子之“道”与刑名法术之学。《庄子》对于作为黄老之学的道家，亦有表现。《天道》篇中有一大段话，其中含如下文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

对这些表述，王夫之《庄子解》称“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所作也”，判定其属于黄老之学的谱系，是很敏锐的。前面一节，指出所谓“无为”其实是在上为君者的专利，而在下为臣者则需努力有为，不可混同^①。稷下之学主要的著述代表《管子》有《君臣》篇，说过：“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慎到亦游稷下^②，《慎子》的《民杂》篇有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韩非子》的《扬权》篇里也明确指出了“君不同于群臣”的原则^③，《主道》并且进而说明了何谓“无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

① 《在宥》篇也有类似的话：“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

③ 胡文英的《庄子独见》以为上引的这番话“议论颇似韩非、慎到”，即有见于此吧。

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这其实已经涉及了上引《天道》的后一节，它标举“天”、“道德”为归依，而“形名”、“因任”、“是非”、“赏罚”等指的乃是在上者操纵臣下，实施治理的程序，即明其职守，循名责实，而后定其是非、赏罚之类。《韩非子》的《扬权》也有与此类似的话：“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调和。”所谓“形名”具有现实的意义，以职守名分为准律责臣下，以求名实之合，换句明白些的话说，就是要求臣下尽其名分而“有为”罢了。其后，《淮南子·要略》也有可以补充揭明此一观念的文字：“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臣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由此可见，《天道》的这些话语背后，蕴含着从先秦到汉初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而从《庄子》则可略窥其消息。

在开始读《庄》之前，我们还得就庄子其人及其书做些说明。

一、《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①；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前叶。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早期的老子和庄子，与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不同，他们的生平事迹很不清楚，弟子也没有那么显赫，虽然我们从《庄子》的《山木》、《列御寇》等篇知道，至少庄子也是有弟子的。弟子不是那么有名，自然没有编纂《论语》或者退而与其弟子著《孟子》那样的事了。老子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已经不能很分明；而《史记》记述的庄子，除

^① 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作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00年，马叙伦《庄子年表》作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载《先秦诸子系年》，香港大学1956年修订本）作公元前368至公元前268年。

司马迁的评说之外，真实的生平事件其实就是《庄子》的《列御寇》和《秋水》里面曾记载的“辞相”而已。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庄子的生平事迹，其实最重要的依据还是《庄子》一书。

不过，《庄子》里面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这些故事之中，很有寓言的味道。

首先，庄子无疑始终处于贫困之中。有时，他甚至需要向人求贷以维持生计：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监河侯的推托令庄子很是恼怒，这可想而知，不过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是讲了一个故事，生动传达了自己的意思。如果熟悉《庄子》，即刻就可以辨认出这是他一贯的言谈、行文的风格，即所谓“寓言”——“藉外论之”。《逍遥游》以鲲鹏始，《秋水》以河伯遇北海若始，都是这样的“寓言”方式。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屨为生：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屨，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织屨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庄子穿的是破衣烂衫：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纆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微也夫！”^①（《山木》）

所谓“大布”就是粗布，不仅粗布而且还打了补丁，就这么去见魏王了：或者这是因为庄子实在没有更好的衣服可以多少装饰一下了，或者他根本就不拿见魏王这件事当回事儿，当然更好的理解是两者兼而有之吧。虽然从这些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②——其品质被贬抑得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细细玩味，似乎庄子有些自相矛盾，先前他一口否定了自己是“惫”，而这里却又说处今日之世难逃于“惫”；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庄子最后的这一转骂得痛快骂得爽，这是最要紧的：这不仅为自己无论是“贫”还是“惫”作了彻底的辩护，而且毫不客气地将魏王之类都骂进了，“昏上”还不直接还不刺激吗？最后

① 处困境而不沮丧，从容面对，有《让王》所记孔子事可以并观：“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的弟子原宪也有类似于庄子分辨“贫”、“惫”的话：“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怩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 苏秦语，见《战国策》的《秦策》。

还提出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比干，剖他心的是人人皆知的昏暴之君商纣！骂国君到这地步还能设想更上层楼吗？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秋水》）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训》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使楚。”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抗拒姿态，甚至可以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

世俗的官场、名利世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高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要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述庄子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者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①。不过，即使对这一有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相而聘之？^②

① 《韩诗外传》（《太平御览》四七四引）谓聘庄子者为楚襄王：“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欲以为相。庄子曰：‘独不见夫人庙之牲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豢，出则清道而行，止则居帐之内，此岂不贵乎？及其不免于死，宰执旌居其前，或持其后，当此之时，虽欲为孤豚，从鸡、鼠游，岂可得乎？仆闻之：左手据天下之国（案：《后汉书》之《仲长统传》及《马融传》皆有此语，分别为“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国”俱作“图”），右手刎其吭，愚者不为也。’”然时代似不密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十八《庄周生卒考》则疑此庄子为庄辛而非庄周，见该书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69页。

②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四。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垥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垥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这里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①。

二、篇目 分篇 真伪

关于《庄子》一书，这里打算谈三个问题：篇数、分篇和真伪。

首先是《庄子》一书的篇数问题。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

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晋人，

^① 庄子的生死意识，参后第五讲《养生》。